

紫禁城文武建筑布局与文德光华

The Symmetr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Moral Cultivation

王子林

Wang Zili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3 Vol.25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三年 第二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紫禁城文武建筑布局与文德光华

The Symmetr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Moral Cultivation

王子林

Wang Zilin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建筑讲究技术与文脉的传承，紫禁城处处体现了这一点，而且是集大成者。宏大的紫禁城除了靠礼制来支撑外，精神的支撑尤为重要。宋代理学为天地立了一颗仁心，明代则为北京城立了一颗仁心。“割文武而制异”，明代北京城被中轴分为东西两半，以东属文，以西属武，建筑即按此分布。本文立足紫禁城的文武建筑布局特点及文武本质，探索建筑背后的思想渊源，发现它是古代道统核心精神的体现。通过阐释文武之道、仁义之道、阴阳之道与设置文武二楼的关系，揭示紫禁城背后的文脉传承及“重其文德之光华”的深远影响力。

关键词：

紫禁城 文楼 武楼 道统 文德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is is fully materialized through the Forbidden City, which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architectural achievements. In addition to rites and ritual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spirit is exceptionally significant. The Song-dynasty (960-1279) Confucianist Learning of Principle (*lixue*) establishes the idea of benevolence, while the Ming Dynasty realized it for Beijing. "Dividing the civil and the martial for institutional differentiation", Beijing in the Ming period is divided into east and west halves by a central axis, with the east featuring the civil, the west the martial, and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planne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mmetrical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ir civil and martial featur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ideological source behind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finds that it embodies the core spirit of the orthodox transmission of the Confucian way (*daotong*). By interpreting the civil-martial way, the benevolent-righteous way, the Yin-Yang way,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ivil and martial pavilions, it reveals the cultural context carried by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highlighting the magnificence of its moral cultivation".

KEYWORDS: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ivil pavilion, the martial pavilion, orthodox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daotong*), moral cultivation

紫禁城虽然总体上是按《周礼》设计，有气势宏伟的五门三朝，但它体现的是礼制，如《礼记注疏》郑玄注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¹天子五门，诸侯三门，这是严格的礼制规定，以便天子行使权力。在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中，左右对称的文武两组建筑群，既是对《周礼》的继承，但又超越了《周礼》，将道统的精神灵魂注入其中，使文武二楼不仅在都城、宫城的布局中起到功能性的作用，还体现了文武之道、仁义之道和阴阳之道，使紫禁城、北京城的规划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上升到精神层面，昭示了古代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文化的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弘扬。如果说宋代为天地立了一颗仁心，那么明代则为北京城、紫禁城立了一颗仁心。

一 文武建筑布局

朱元璋定都南京，创建紫禁城，于正殿奉天殿东西两侧建文楼、文华殿和武楼、武英殿。左文右武，源于天象壁星和奎星，壁星为东方七宿之壁宿，它由两颗星组成，是天上的图书府，又称东壁。奎星为西方七宿之奎宿，由十六颗星组成一个封闭的形状。二者正好东西相望。《礼记·曲礼下第二》曰：“在府言府，在库言库。”郑玄注曰：“官谓版图文书之处，府谓宝藏货贿之处也，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宋代陈祥道解释曰：“《曲礼》曰：‘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天文东壁为文府，西奎为武库。”²《晋书·天文志上》卷一一：“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紫禁城文华殿的对联曰：“西崑峙群玉之峰，宝气高腾册府。东壁耿双星之耀，祥辉遥接书林。”朱棣迁都北京，承其宫城规制。北京紫禁城建成之日，大学士杨荣、李时勉等亲睹宫城壮丽，杨荣《皇都大一统赋》曰：“文楼、武楼之特耸，左顺右顺之并建。若乃震位毓德，文华穹隆；亦有武英，实为斋宫。”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曰：“奉天屹乎其前，谨身俨乎其右，唯华盖之在中，竦摩空之伟构。文华翼其在左，武英峙其在右。”李时勉《北京赋》曰：“东崇文华，重国家之大本；西翊武英，严斋居而存诚。”陈敬宗《北京赋》曰：“翊以文楼、武楼、左阙、右阙之嵒口。”文武二楼位于正殿奉天殿东西两侧〔图1〕，文华殿翼其左〔图2〕，为国家之大本；武英殿峙其右〔图3〕，为谨身之斋居存诚。东文西武的布局在宫城规划中体现了出来，它不仅对三大殿形成拱卫之势，而且还具有某种精神价值的作用，可见文武二楼在宫城布局中的重要性。

文武二楼源于周代朝门外的两块石头，嘉石和肺石。



图1 奉天殿与文武二楼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明堂位》卷三一，《钦定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 (宋)陈祥道：《礼书》卷三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图2 文华殿



图3 武英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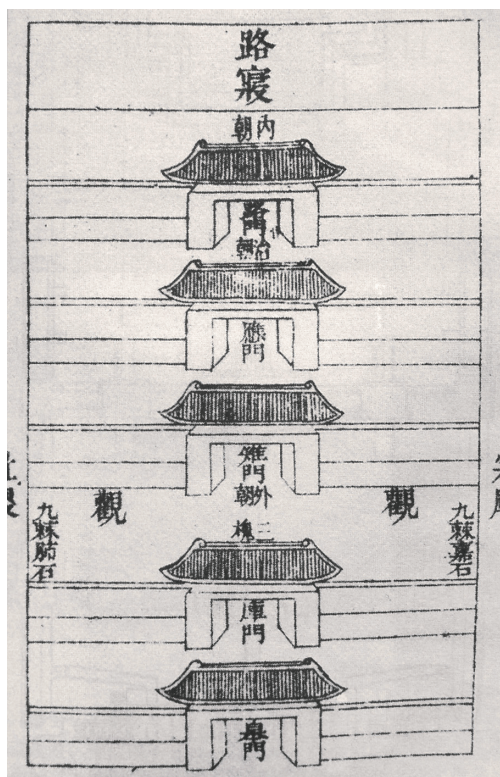


图4 周代朝门外的嘉石和肺石
采自清乾隆《钦定周官义疏》

《周礼·大司寇》记：“以嘉石罢平民……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茆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朝士》亦记：“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唐人贾公彦疏曰：“嘉石，文石也者。以其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称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罢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肺石，赤石也者。阴阳疗疾法，肺属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¹设于朝廷门外左边的是嘉石，右边的是肺石〔图4〕。设嘉石的目的是使有罪过但还没有触犯刑法的人跪在嘉石上，以令其悔改。设肺石的目的是让那些有冤屈，而地方长官又不受理，无依无靠的孤老独幼可立于肺石上三天，以显其赤心不妄告，士便会出来受理其诉讼，上报主管官员，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对地方长官给予处罚。到西晋时建立了直诉制度，所以自西晋时起，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有重大冤屈者击鼓鸣冤，直诉中央甚至皇帝。唐宫城承天门朝堂外东置肺石，西设登闻鼓，就是这一制度的反映。《唐会要》记：“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捶鼓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²唐玄宗建大明宫时，于含元殿前建钟楼和鼓楼，则把二者演变为配楼的形制。《新唐书》记：“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四，《钦定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宋)王溥：《唐会要·通制之属》卷六二，《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西门而入……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¹宋代继承唐宫阙之制，于殿庭左右设钟鼓楼二楼，《宋史》记：“太宗召工造于禁中，逾年而成，诏置于文明殿东鼓楼下。”又记：“设鼓楼钟楼于殿庭之左右。”²金中都仿北宋汴京，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宫城位于中央，皇城在宫城的南边。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内辟驰道直达宫城正南门，驰道东西两侧建有千步廊。据《金图经》记载道东建文楼，道西建武楼〔图5〕。元大内继承了这一制度，萧洵《故宫遗录》云：“大明门旁建掖门，绕为长庑，中抱丹墀之半。左右有文、武楼与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³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解释说：“钟楼又名文楼……鼓楼又名武楼。”⁴可知，金代和元代的文武二楼，实际上就是唐宋时期的钟鼓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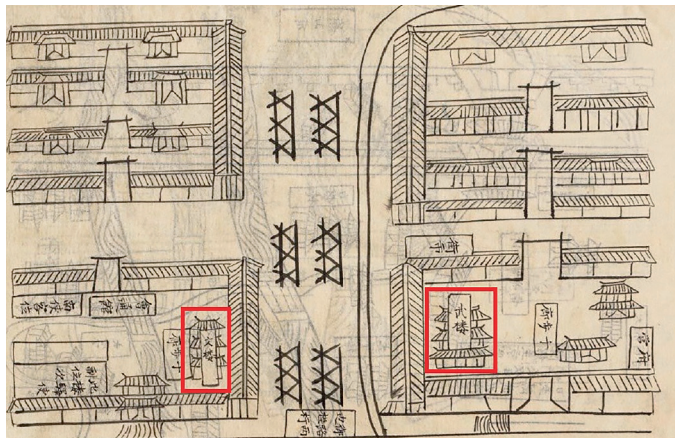


图5 金南京城中文楼与武楼位置图

采自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外集上》中的“南京图”局部

元大内继承了这一制度，萧洵《故宫遗录》云：“大明门旁建掖门，绕为长庑，中抱丹墀之半。左右有文、武楼与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³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解释说：“钟楼又名文楼……鼓楼又名武楼。”⁴可知，金代和元代的文武二楼，实际上就是唐宋时期的钟鼓二楼。

金中都的文楼、武楼位于宫城南门外驰道的东西两侧，元大内文楼、武楼，则位于元大内正南门大明门内正殿大明殿的左右。明紫禁城文楼、武楼承袭元制，建于正殿奉天殿左右两侧。姜舜源先生在《五行四象三垣两极与紫禁城》一文中，从五行的角度首次提出紫禁城、北京城内凡属文化、文治方面的建筑、设施多在东侧，从木从春，如文楼（体仁阁）、文华殿、万春亭、南三所、端凝殿、传心殿、太庙、孔庙、崇文门等；凡属兵刑、武备性质的宫殿、设施多在西侧，从金从秋，如武楼（弘义阁）、武英殿、千秋亭、慈宁宫、懋勤殿、军机处、社稷坛、宣武门等⁵。这种布局，笔者发现元大都城已见端倪，元大内正殿大明殿东有文楼，西有武楼；大都城东有崇仁门（明东直门），西有和义门（明西直门），东为文、仁，西为武、义，但元大都布局强调的是建筑的星象分野，如《析津志》所言“世祖皇帝统一海寓，定鼎于燕。省部院台、百口庶府，焕若列星”⁶，李洧孙《大都赋》亦称元大都“放紫极而建庭，棖题炳乎列宿。……都省应乎上台，枢府协乎魁躔。霜台媲乎执法，农司合乎天田。詹事、宣政、卫尉之院，错峙而鼎列；宣徽泉府将作之署，棋布而珠连”，元大内是紫微垣，北中书省是上台星，枢密院是斗魁，大理寺是执法星，大司农是天田星，其他如詹事府、宣政院等官署都是按天上列星而分区布置，所以大都城布局虽有东文西武的意思，但并没强调突出这一特性。

明代北京城在元大都城东文西武的基础上，强调突出了都城文武布局特点〔图6〕，由此超越了元大都城。笔者查阅到永乐时大学士李时勉《北京赋》中有如此一段文字：“至于五军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

1 《新唐书》卷二三上，《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宋史》卷四八、七〇，《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明）萧洵：《故宫遗录·元故宫遗录序》，豫章丛书，两淮马裕家藏本。

4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252页。

5 姜舜源：《五行四象三垣两极与紫禁城》，《清代官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

6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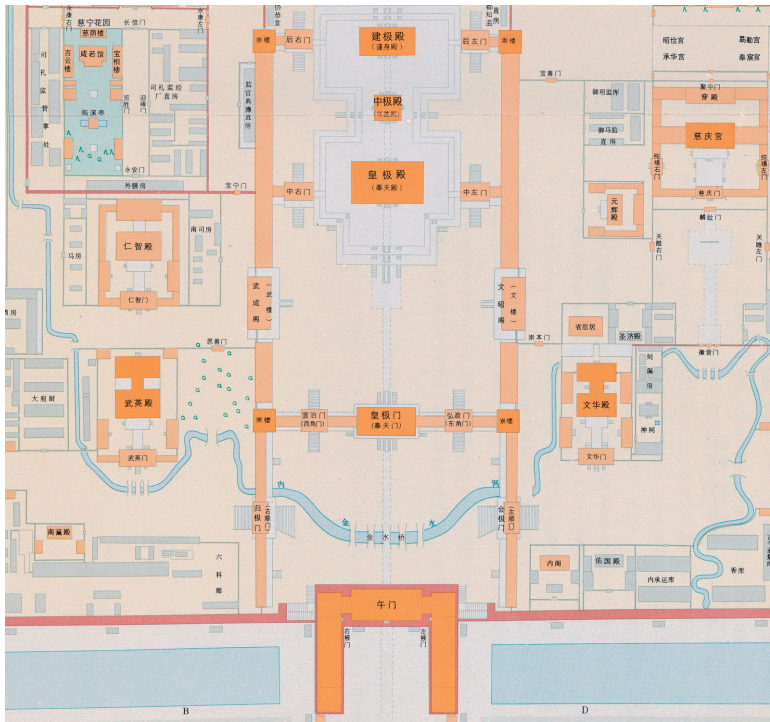


图6 紫禁城前朝文武二楼布局图
《明天启紫禁城图》



图7 大明门（大清门）

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刑部，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东有敷文牌楼，西有振武牌楼，故“割文武而制异”，形成了显著的东文西武的都城格局〔图8〕，并与紫禁城中的文楼、文华殿和武楼、武英殿遥相呼应，这是明代以前所未有的都城规划。同时文武二楼还成为官员站位及身份的标志，《明会典》规定：“文武百官齐班，位于午门外之东西北上。文官侍立，位于文楼之北西向；武官侍立，位于武楼之北东向。”³文官要站在文楼前，武楼要站在武楼前。这种文武官员分东西站位法，自汉代就已出现，《史记》记：“汉七年，

位，严署宇之齐设，比馆舍而并置，列大明之东西，割文武而制异。”¹确证了永乐时的北京城规划布局以中轴为准，将整个城市分为东文西武。这种文武格局，在朱元璋所建南京城中已体现出来了，洪武二十五年：“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上谕廷臣曰：‘南方为离明之位，人君南面以听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则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礼也。五府六部官署宜东西并列，其建六部于广敬门（按：洪武门）之东，皆西向；建五府于广敬门之西，皆东向。惟刑部掌刑已置于西北太平门之外，于是以宗人府、吏、户、礼、兵、工五部，列于广敬门之东；中左右前后五府、太常司列于广敬门之西，悉改造，令规摹宏壮，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²永乐帝迁都北京，完全仿照朱元璋的南京城的左文右武格局，大明门位于千步廊南端〔图7〕，是明朝的国门，位于中轴上，迤东是属文的建筑如文官办公衙署吏、户、礼、兵、工部及鸿胪寺、钦天监等机构，迤西是属武的建筑如武官办公衙署中、左、

1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

3 《明会典》卷四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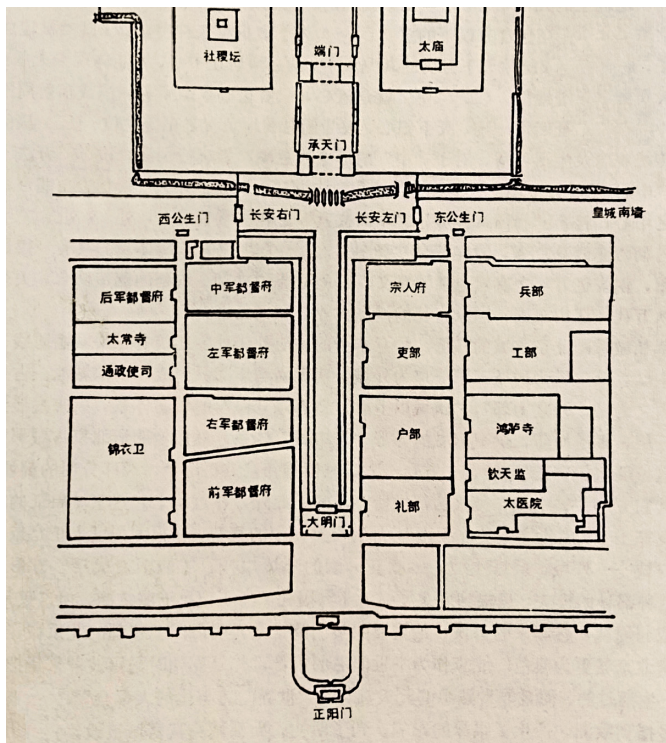


图8 明北京城中央官署机构分布图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明北京复原图》



图9 永乐大帝像

长乐宫成。……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¹

左东右西、一文一武的建筑格局，实际上是传统文武之道的体现。永乐元年春正月，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御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图9〕，颁布敕谕曰：“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此道，历代以来用之则治，不用则乱，昭然可见。……尔文武群臣，职无崇卑，体朕斯怀，各尽其道……为民造福，悉力一志，敬之，慎之。”²

春正月，如《春秋》所记为大一统的标志，政教之始。“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³，永乐帝称治理天下靠的是君臣一心，文武群臣，各尽其道，为民造福，这个道是从尧舜禹汤文武那传下来的，而尧舜文武之道又是法天之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上天之德，好生为大”，天把恩惠施给普天之下，没有私心，故法天的本质是要爱人为本。这则敕谕无疑是对日后紫禁城文武建筑格局的注脚，同时它也道出了儒家治国的道统思想即尧、舜、禹、汤、文、武的为君之道为法天之道，所谓法天之道即为上天之德，上天之德即是好生为大，故为君之道就是要爱人为本，爱人为本即为仁德（仁道），以此治理国家则为行仁政。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3页。

2 《明实录·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台北“中研院”校印，1966年，第291页。

3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离娄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二 文武二楼与重其文德

文武之道源于《论语·子张》：“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朱熹注曰：“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¹文武之道指的是文王、武王推行的礼乐典制。《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称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措施都记录在典籍中，“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称这样的人在世，这些政事就能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中庸》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之天子之礼。”文王继承父志，开创基业，武王晚年接受天命，战无不克。至周公时，才成就了文武之德，制礼作乐。

《礼记·杂记下》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强调宽严相济乃为治国的文武之道，与《论语》《中庸》所说的文王、武王之道稍有所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论语·八佾》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²孔子一切以文武之道为圭臬，文武之道是文王从尧舜那儿继承下来的，也就是说文武之道源自尧舜之道。尧舜之道是道统的雏形，尧舜之道是什么呢？《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朱熹注曰：“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宗庙以面为牺牲，断死刑必为之涕泣，天下知其仁慈，可谓有仁闻。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乱，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³尧舜之道就是仁道，要切实实地把恩惠施与普天之下，而不是只有所谓的“仁心”“仁闻”而已。所以文武之道上遵循天时，下符合地理。就好像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载的。又好像四季的交替运行，日月的相互照耀。万物共同生长而不相害，道路并行而不冲突。小德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德则可使万物敦厚淳朴。将文、武与尧、舜联系在一起，并提高到了与天地同辉的高度，二者的特点是具有包容、仁慈万物的大德。《孟子·告子章句上》曰：“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尧舜之道其核心是文德。“文德”一词出自《尚书·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图10〕，是说大舜的仁德之风广泛地传遍天下，既如圣人又如神明，文经天地，武戡祸乱。禹停止征伐三苗，班师而归，大舜接受了益和禹的建议，开展礼仪教化，推行文德。并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干羽舞蹈，表示偃武修文。《诗经·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是说宣王推行文

1 (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子张第十九》，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2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9年，第139页。

3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离娄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图10 大舜敷文德图
采自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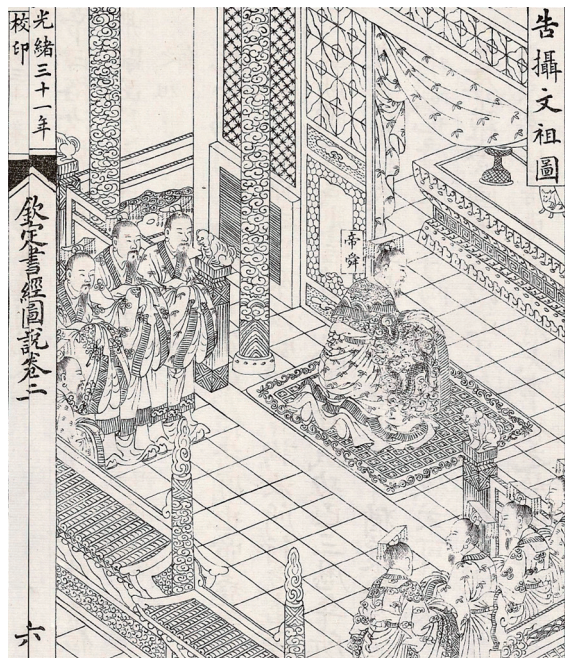


图11 告攝文祖圖
采自《欽定書經圖說》

德，天下和睦。《论语·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修治文德就可以使远方之人归服。故文德为仁慈、敦厚、温和、纯正等义。《尚书·尧典》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郑玄注曰：“言尧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谓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尧具有诚实、恭敬而又谦让的品德，所以他的德行光耀四海，与天地同辉。《尚书·舜典》曰：“帝舜重华，协于帝。”称舜继承了尧的志向，名重华。孔颖达疏曰：“此舜能继尧，重其文德之光华。用此德合于帝尧，与尧俱圣明也。”唐代孔颖达将尧舜之德称为“文德”。

文是一个美好的词，《逸周书》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¹，故《尚书·舜典》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尧太祖的宗庙称文祖〔图11〕，则是赋予“文”这个词以最高境界，姬昌死后谥号为“文王”，说明继承了文祖之德。《诗经·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笺》称“文”为“文德”义，昔尧遭洪水，黎民阻饥，后稷播植百谷〔图12〕，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是因为周的先祖后稷有文德，解决了百姓吃饭的问题，功能配天。《诗经·皇矣》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上帝说文王有仁慈之德，从不用厉声厉色去教育百姓，《诗经·清庙》：“秉文之德，对越在天。”天德清明，文王有文德，故《中庸》曰：“《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天命是美好而不停息的，文王是最具有这种德的禀赋者，故称文王之德纯正，辉煌而光明。因为它来自尧舜，来自上天。

¹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溢法解第五十四》，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



图12 后稷教民稼穡图
采自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



图13 周文王像
采自《古今君臣图鉴》

周文王是具有文德的典型代表〔图13〕，后世将具有文德的君王称为太平天子，如唐代杜牧《感怀诗一首》所言“扶持万代人，步骤三皇地。圣云继之神，神仍用文治”，为了世世代代，遵循三皇治国原则，唐太宗以文德治理天下，于是天下太平。

把都城设计为文武分离的格局，是文武之道的体现，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在建筑上的体现，目的是“秉文之德，对越在天”。文武之道源于周文王、周武王治国礼乐典制，为孔子所推崇，成为儒家的理想政治，其核心是仁政，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所言“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

三 体仁弘义二阁与仁义之道

《中庸》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之后，接着说：“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推行文武之道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根本在于修身。修身要遵循道德，遵循道德要以仁义为本。仁，就是人自身具有的爱人之心，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到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说明文武之道实际上就是仁义之道。

《大清会典则例》记：“顺治元年，定鼎燕京，上大清门牌额。二年定正中三殿名，殿前曰太和门，门之左曰昭德门，右曰贞度门，东庑之中曰协和门，西庑之中曰雍和门，太和门之后曰太和殿，殿之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东庑之中曰体仁阁，西庑之中曰弘义阁。”¹顺治二年将文昭阁（文楼）改称体仁阁〔图

1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一二六《工部·营缮清吏司·宫殿》。



图14 文楼（清体仁阁）



图15 武楼（清弘义阁）

14]，武成阁（武楼）改称弘义阁〔图15〕，文更易为仁，武更易为义。汉代《周易乾凿度》记：“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¹震指东方，黄道与赤道交于东方角宿，为春分，阳气始生，万物出于此，故东方为仁。《周易乾凿度》又曰：“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事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²西方为兑卦，万物各得其宜，为阴为义。《礼记·乐记》称：“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东汉张衡《东京赋》：“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三国薛综注曰：“东方为木，主仁……西为金，主义。”所以文武二楼又是仁义之道的体现。文武本为仁义，故清代虽易名，实质上仍继承了道统谱系中的核心价值观。

弘义，出自东汉班昭《女诫》：“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弘义即大义，指要遵守社会伦理道德。

体仁，出自《周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作为君子首先要效法天德，体现为仁德，才能够去教化他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使之形成一个仁爱的社会，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君子本性为仁，仁即善，践行之则谓仁德，仁德效法天的元德。

仁，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仁是亲的意思，对人友善。追根溯源，仁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他将仁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论语》中记载有关仁的话题大约有109条，其中孔子的弟子曾四次问仁是什么，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核心是爱人，不要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别人。《中庸》说：“仁者，人也。”孔子对颜渊说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仁，是一种爱，“泛爱众，而亲仁”，由对亲人的爱推及他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³。同时也是一种克己的修养功夫。它不但是对德性的统称，具有恭、宽、信、敏、惠的品德，还要做到平时起居端庄恭敬，做事严肃认真，对

1 （汉）郑成康注：《周易乾凿度》卷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汉）郑成康注：《周易乾凿度》卷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章句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待他人忠诚有信。仁是“先难而后获”的付出，同时还要长期地坚持下去，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以仁是一种发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终极价值。

孟子不仅发挥了孔子的仁，还把仁与义结合起来，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首先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尽心章句上》曰：“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

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¹天下一统，百姓乐业，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实现。孟子说伯夷、伊尹和柳下惠虽然他们的好恶不同，但所行道却是一样的，“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²，以怜悯别人的心情来实施怜悯别人的政治，那就是仁政，孟子把仁义移植到仁政上，“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³，“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⁴，推行仁政，百姓就会像人被倒挂着而给解救了一样高兴。《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不行仁政，“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⁵，《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⁶

怎样才能保证仁义的推行呢？

一是将仁义道德化。唐代韩愈称道德的内容就是仁义。他在《原道》中开篇就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⁷他说博爱叫作仁，去践行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走下去便是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与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所以韩愈称他自己所说的道德，都是结合仁义说的，是天下之公论，不容置疑。

二是将仁义本性化。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⁸，人皆有“四端”，生而有之，为先天所赋予。

三是将仁本体化。宋代二程将仁义统归为仁，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⁹张栻曰：“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¹⁰将仁从四德中抽离出来，与人性相结合，二程说“仁自是性”。

1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2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

3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4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5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6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离娄章句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7 (宋)姚铉：《唐文粹·原道》卷四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告子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9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二《遗书》，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10 (宋)张栻：《南轩集》卷一八《仁说》，四库全书本。

四是将仁心灵化。天地原本无心，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儒家则赋予天地以仁心，并把它绝对化。朱熹把仁看成是上天生成万物的那颗心即仁心，上天将仁心赋予人与万物，人与万物得此心为心，这个就是上天之德的表现。朱熹说：“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统。”¹明代曹端《通书述解》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者，为一心之全德，万善之总名。体即天地之体，用即天地之用；存之则道充，居之则身安。故孟子既以天之尊爵目之，复以人之安宅名之。”²

当达到了上面的要求时，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也就产生了，守天下国家只能靠仁，《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大戴礼·武王践祚》记武王践祚时，曾问士大夫，有没有藏之简便，行之有效，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的治国之策呢？师傅吕尚曰：“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皆谓创基之君十百世，谓子孙无咎誉者于十百之外，天命则有兴，改其废立，大节依于此。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谓止于其身也。”³长治永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以仁守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亦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清代将文楼改称体仁阁，武楼改称弘义阁，目的是强调守天下曰仁。

四 文武二楼与天之大德

《周易乾凿度》称东方为震卦，是阳气始生之处，西方是兑卦，是阴用事而万事得其宜。古人以左即东为阳，以右即西为阴。文楼位于东方，属阳，武楼位于西方，属阴，东为阳，西为阴，整个紫禁城和北京城被分成了阴阳两半，故文武二楼背后又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

什么是一阴一阳呢？

宋代王宗传《童溪易传》称：“窃原《易》之始作也，则亦本诸一奇一偶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动必有静，有刚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长，盖亦有无对待而能无穷者，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圣人得其说，据以之以为《易》，故一奇一偶立，而阴阳兴，阴阳兴而动静、刚柔、屈伸、消长之理在是矣。”王宗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指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简单地说，就是对立运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一阴一阳的本义源于《易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从下往上数，第一层是太极，第二层是一阴一阳（称作两仪），第三层是第二层所生之一阴一阳即四象，第四层是第三层所生之八卦，八卦再生出六十四卦，如此循环下去，可至无穷无尽。每层都是一阳生出一阴一阳且一阴也是生出一阴一阳，这就是阴阳变化的道路，故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也就是天生万物之道，因为原始为一，一生二，二生

1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七，《克斋记》，四部丛刊本。

2 （明）曹端：《通书述解》卷下，《颜子第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3 （汉）戴德：《大戴礼·武王践祚第五十九》卷六，《钦定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可以无穷无尽地生下去，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一阴一阳之谓生。

明人吕坤《呻吟语》曰：“万物生于阴阳。”生命是阴阳交会的产物。相传为周文王姬昌所作，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万物的产生源于宇宙中的一股浩大的元气，元，《子夏传》解释称“元，始也”，它是万物的创始，具有统御天体运转的功能。有了它才能分离出阴阳二气，二气相交，才能行云布雨，普降甘沛，各类事物因此而获得了各自不同的形体。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另一部儒家重要的经典《周礼》解释万物的产生亦是阴阳交会的结果，“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记》亦认为万物产生的根本在于阴阳的交会：“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地气即阴气上升，天气即阳气下降，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地相互激荡，雷霆来鼓动，风雨来振奋，四时来运行，日月来照耀，万物因此而化育生长¹。



图16 朱熹像

阴阳的交会产生生命，而且永无停息，说明生是天的本性，生即仁，朱熹〔图16〕曰：“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的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²由天地生物，上升到仁，由仁上升到天心即“动而善之意”，如此盈天地皆在仁之孕育之中。朱熹称：“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³天地之心只想着生物，大德曰生，因万物为其所生，故而万物禀赋此心。人因先天禀赋天的本性，故而具有仁心。所以阴阳之道便是生生不息之道，这就是天道。人的本心即天心，天心即仁心，仁心即道心，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是充满生气的，有了此心，就可以赞助天地，发育万物。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终极的命题在儒家这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阴阳之道是北京城、紫禁城文武格局背后隐藏的自然规律。早在先周时代，周的先祖公刘建城时“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城市的规划要与阴阳结合，“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的产生是由于阴阳的结合，城市有阴阳，则有生气。从文武之道到仁义之道，再到阴阳之道，使紫禁城的文武建筑布局上升到了认识本体论的高度即天的本性上。天的本性是主生的，故而才产生了万物，有了生命。紫禁城的文武建筑正体现了这一本质，被注入了上天之德，成为紫禁城的精神灵魂。这个精神灵魂，就是道统的核心。

1 参见王子林：《抱蜀不言：乾隆七十三年坚守》，故宫出版社，2021年，第218页。

2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巴蜀书社，1986年，第240页。

3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三，中华书局，1986年。

五 道统的传承与核心价值

要将一种文化定为千年不变之文化，而且要代代相传，儒家创造了道统，并把道统建立者和传承者祖先化和圣人化，以唤起后人的责任与担当。同时最重要的是道统核心精神的确立，把道统转化为传心，使道心成为一身之主，坚守道统成为自觉行为。

道统最早由朱熹提出，他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中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相传就是道统相传。道统源于《尚书》所记，尧传与舜“允执厥中”，舜传禹是“来，禹！……天之

历数在尔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将“允执厥中”作了扩充和深化，发展为十六字。尧传舜〔图17〕、舜传禹的核心思想是“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永守本心，不然百姓困苦，天命就会终结。天命的传承与百姓是否过得好不好，也就是要对百姓施善政即仁政。

汉代董仲舒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¹道出自天，与《尚书》相接，即“天之历数在尔躬”，它一以贯之。

道统的确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出自天，二是施仁于民。为何这样说呢？前面已经论证，天之大德在于生，生即是仁，天的本性是善，尧、舜、禹亲爱百姓，具有天的德性，故而天授之。《孟子·万章章句上》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是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却不能强迫天把天下给予他，要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让天接受的方法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强调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百姓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天命在于德。孟子举了一个例子是百姓选择了启而没有选择益的原因是：益相禹，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而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历年多，施泽于民久。所以孟子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比如说孔子，虽是圣人大德，因没有天子的推荐，便不能得到天下。世代相传而得到天下的，如果天要废弃他，一定要像夏桀、商纣那样残暴无德，而益、伊尹、周公虽是圣人，因为逢的君主不像桀、纣，便不能得到天下。所以孔子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唐尧虞舜以天下让



图17 尧历象日月星辰
采自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

¹ 《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8页。



图18 孔子像

贤，夏商周三代却世代代传于子孙，道理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思想下，孟子将三代君主，包括汤、文王、武王和圣人位列在一起，构成一个道的传承体系，其核心是德即仁。

《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孟子第一次说出了儒家认定的代代相袭的圣人名单，他要接续之以弘扬仁义，称自己“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¹。

唐代韩愈《原道》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²韩愈对孟子的道统，作了简化，确定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是道相传的关键性人物，然而道传至孟子时就断了，故他要承担起拯救道统的责任，“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³。

宋代石介《徂徕集》将道统提前至华夏族的始祖伏羲，并赞扬了韩愈的作用，曰：“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数百年复有吏部。”⁴石介认为道统的传承有赖于两位核心人物，一位是孔子〔图18〕，一位是韩愈，孔子是圣人之至，韩愈是贤人之卓。

宋代朱熹以“道统”一词来总揽道的传统，从此道统为中华文明的起始、继承和发展确立了一个渊源之说，称道统是由子思作《中庸》而明于天下的。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道统相承的“十六字心传”，道统相传实传心，要坚守道心，去人心：“《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

1 (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290页。

2 (宋)姚铉编：《唐文粹·原道》卷四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 (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送王秀才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4 (宋)石介：《徂徕集·尊韩》卷七，《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¹

元代吴澄强调道统出于天，继承石介之说，称道统始于伏羲、神农和黄帝之时，并延伸至周子、二程、朱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羲、农、黄帝，继天立极，是谓三皇，道统之传，实始于此。黄帝而后，少皞、颛帝、高辛继之，通尧、舜谓之五帝，尧、舜、禹、皋，君臣也，而并此唐、虞之际，所以为盛也。成汤、伊尹生于商之初兴，而传说生于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于周之盛际，而夫子生于周之既衰，夫子以来始不得位，而圣人之道不行，于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颜、曾得其传，颜子早死，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我朝周子始有以接孟子之传于千载之下，其时有邵子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子则师于周子，张子则友于二程而传其学；中兴而后，又有朱子，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统之传者也。圣贤继作，前后相承，吾道正脉赖以不坠。”²

道统，实际上是在为天地立一颗仁心，有了仁心，才能构建一个文化传承的脉络，所以这条脉络的核心为文德即仁，故笔者认为称为“文统”更为契合，起于文祖，终于文公（朱熹）。道统千年相传，其赖以不坠的根基就是仁，所以圣圣相传即是传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故朱熹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气形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心分为人心和道心，道心也就是本心即天心，守其本心，须臾不离，就能战胜贪欲之心，允执厥中。

尧舜禹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又是文化的源头，所相传的道统，是生生不息之谓仁的道统精神。所以中华文明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祖先、文化和生命，祖先就是我们的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谓道统就是文化的代代传承，因此坚守道统就是坚守生命，如《论语》所言：“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紫禁城文武建筑格局体现了这一坚守。

六 结 论

当我们站在太和殿的月台上时，放眼望去，东边是体仁阁，西边是弘义阁，凡与文、仁、春有关的建筑皆位于东方，凡与武、义、秋有关的建筑皆位于西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春回大地，阳气升腾，西方

1 （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第16页。

2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续集》卷二，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是太阳落入的地方，七月流火，阴气凝聚，形成城市中的一阴一阳，与宇宙、天地、世界的阴阳组合是一致的。大地东西平面与天地上下立面组成一个阴阳交流的空间，万事万物因此而皆禀赋此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产生生命的动力和源泉，因而人皆具有仁心，这是文脉代代相传的根基。

紫禁城、北京城的文武建筑布局，是传统文武之道、仁义之道和阴阳之道的体现，其文武理念原出于天，始于文祖，辉煌于文王。阴阳交流产生生命，因而天是主生的，其本性是善。从尧舜开始，经孔子、孟子、朱熹等人的发挥，将之上升为天道。天道主生，天道要传下来，要依赖于圣人，儒家所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个道统，以仁为根本，成为道统的精神灵魂，“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产生了万物，人作为万物之长，故要代行天地之仁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¹，保持天心，以仁存心，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生命的目的。建立在这个道统精神之上的北京城、紫禁城才有一颗仁心，才能如月之恒，日之升，如南山之寿，永不崩塌。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1 (宋)朱熹：《四书集注》，第15页。

